

[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著

走近真实

科学、意义与未来

执行编辑 朱亚当

译者 龚 勋

*CLOSER TO
TRUTH*

***Science, Meaning &
the Futur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伦斯·库恩 著

走近真实

科学、意义与未来

执行编辑 朱亚当

译者 龚 勋

CLOSER TO TRUTH

*Science, Meaning &
the Futur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真实: 科学、意义与未来/(美)库恩(Kuhn, R. L.)著;
龚勋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 Closer To Truth
ISBN 7-208-06147-5

I. 走... II. ①库... ②龚... III. 科学技术-普及读物
IV. 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47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执行编辑 朱亚当
责任编辑 陈 蕾 毛晓秋
装帧设计 王小阳



走近真实: 科学、意义与未来

[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著
龚 勋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80×980 毫米 1/16
印 张	22
插 页	3
字 数	284,8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147-5/G·1062
定 价	36.00 元



关于作者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一个身兼多职、在多个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人。

作为科学家的他，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曾任纽约大学副教授、得克萨斯大学高级研究员，现任克莱蒙大学理事、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委员；

作为著名投资银行家、公司战略家的他，担任花旗集团的高级顾问，负责并购、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

作为作家的他，撰写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投资银行学》等25本书；

作为电视节目制作人的他，策划、制作了《走近真实：科学、意义与未来》、《探索中国：来自中国的声音》等电视系列节目；

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他，一直担任中国的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和媒体等方面的顾问，推动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目 录



- 1 宋健序 科学探索无竟时
- 6 执行编辑的话 (朱亚当)
- 10 作者序 寻找意义

- 31 前 言 什么是走近真实?

第一部分 大脑与思想

- 36 第一章 科幻小说科学吗?
- 56 第二章 为什么音乐如此重要?
- 68 第三章 意识是虚幻的吗?

第二部分 生物学与医学

- 86 第四章 自闭症患者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 104 第五章 精神病学具有分裂的人格吗?
- 116 第六章 什么是超心理学?
- 135 第七章 超感会影响你的生活吗?
- 153 第八章 谁来验证替代医学?
- 167 第九章 微生物——朋友还是敌人?
- 183 第十章 新药测试——人类是天竺鼠吗?

第三部分 宇宙与天体生物学

- 202 第十一章 宇宙的秩序是如何产生的?
- 217 第十二章 为什么宇宙如此神奇?

234	第十三章 宇宙中充满了生命吗？
-----	-----------------

第四部分 科学与我们的世界

252	第十四章 计算机将进入量子时代吗？
-----	-------------------

268	第十五章 基础科学是如何支持国家安全的？
-----	----------------------

第五部分 科学与宗教

288	第十六章 宗教能抵挡住技术进步吗？
-----	-------------------

306	第十七章 我们能否同时相信科学和宗教？
-----	---------------------

330	嘉宾简介
-----	------

344	关于作者
-----	------

宋 健 序

科学探索无竟时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逐步摆脱了非理性观念的桎梏,走上了实验科学的理性道路。经过 400 年的艰难历程,人类学会了理性思维,看穿了大自然的若干奥秘,增强了驾驭大自然的能力,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Francis Bacon, 1561—1624)终成人类共识。20 世纪以前,研究科学的动力多来自科学家个人的好奇心,20 世纪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科学对国家强盛、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有根本性作用,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都争相建立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体系,由政府出面领导和筹划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实施“大科学”工程,实行全民科学教育和推广应用,导致了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大突破、大发展,使人类社会全面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或谓高科技时代,使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到科学的恩惠。

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的 30 多亿年历史相比,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出现不超过 10 万年,仅占地球生命史的十万分之一,而真正现代科学的出现才 400 年。人类还太年轻,自然科学的资历尚浅,阅历尚窄。科学技术的出现有如发生在昨天晚上的事,在地球生命史上只是一刹那。尽管人类已积累了浩瀚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万卷不足罄,但积累时间还是太短。从哥白尼(Copernicus, Nicolas, 1473—1543)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 年)至今,九大行星之一的冥王星绕太阳走了不足两圈。人类的远祖哺乳类动物从出世到现在不到 2 亿年的时间里,太阳携诸

行星绕银河系中心转了还不到一圈。有些科学理论,不论是经典的或现代的,仍可认为是急就章。例如被列为宇宙标准模型的“宇宙大爆炸创生论”,尽管其推论大致与物理定律相洽,与天文观测一致,但没人能说明大爆炸奇点的来历。偌大宇宙的质能都冒自这个奇点的爆发的观点终不能为人们信服。物理学家们只好谗请与其争吵了400多年的对手——上帝来帮忙:把提这类问题的人都送入地狱。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航天技术,这为人们提供了到地外观察太阳系和宇宙空间的可能性。在这以前,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都囿于地球表面。载人的和不载人的空间探测,肯定了大部分以前从地球表面观测到的诸现象的解释和规律——物理定律,同时对原有科学体系也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例如,50年前很少有人相信,生命可能在太外其他星球上发生。虽然至今在地球以外仍未发现生命存在的证据,科学界主流却已逐步认同或默许探测外星存在生命这种活动的科学价值。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一千多亿颗恒星中很平凡的一个,地球在太阳系中地位并不特殊,最多是较幸运的一个罢了。不管现代科学显得多么伟大,科学大厦多么宏伟,它的基石是地球表面,我们的视野和接触范围仅是太阳系,仅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角落。一旦人类走出地球,进至太外,眼界必会大开,必然会发现现有科学框架所不能包含的事物和现象。这会迫使人们去建立新概念,提出新假设,创造新理论,或修改旧理论,像量子力学对牛顿力学那样。

古人类学已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人类的祖先于数百万年前与人超科(Hominoidea)中的近亲林猿科(Hylobatidae, lesser apes)和猩猩科(Pongidae, great apes)中的同类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自己的进化道路。人类(Homo sapiens)是第一个获得理性思维能力的群体。我们有资格为此骄傲,以大写的“人”字自诩。人类的活动从未脱离动物界生存竞争的现实。科学也一样,至今仍然宣布为人类谋利益是最高原则,主流观念和行为都以自己为中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太阳和星辰必须绕地球转,地上的一切都是为亚当的后代而存在,大众要服从天子,猴群要服从猴王。200年的民主运动仍没有彻底改变祖先流传下

来的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Law of Jungle)。科学中有一个雅名叫“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一切科学定律都应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利,否则就有违犯伦理道德之嫌,会遭到政治、宗教和世俗的反对。布鲁诺(Bruno, Giordano, 1548—1600)被烧死,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被判终生监禁,马丁·路德·金(King, Martin Luther, Jr. 1929—1968)被暗杀,马寅初(1882—1982)被大批判等,就是“人择原理”的体现。20世纪以后,形势有了喜人的变化。证明了恒星中的核反应机理和太阳50亿年后必定熄灭的物理学家们,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奖。太阳必灭,地球上生命必消亡,彼时人类如果不会逃脱或迁移的话,也将灭绝无疑。这种可怕的前景,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悖。这类科学理论居然能为社会平静地接受,说明人择原理的影响已逐步减小,人类社会已经成熟了一点,能够超脱地看待科学真理。但是,人类始终是动物界的一员,有人称之为“裸猿”(Naked ape),即不长毛的猿,所以要摆脱生物界遗传给我们的习性和气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中形成的亲、尊、长、幼,君、臣、父、子,逐级服从的社会风尚,往往钳制着人们勇敢地去面对科学。孩子们必须服从父母,学生必须相信老师所讲的一切,对教科书上的东西不能置疑,古训不可悖,权威不能怠。已有的科学定律不准讨论或修改。试卷设标准答案,不允许考生有所发挥。这些都与现代科学精神不尽相容。激励青年和后代参与讨论,反复进行实验,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力求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假设,创立新的理论,是发展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惟一正确道路。我们已积累的科学知识,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定律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性,至少是因为视野还太窄,经历还太短。现代科学技术所触及的范围仅仅是地球表面和近地空间。我们对海洋深处、地球内部、太阳系边沿、银河系和河外星系,以至于人类自己的智能思维都知之甚少。已有知识的相对性还因为对每一类自然现象的解释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假设,只要自洽又与其他理论和实验结果相容就可以成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关于原子核的模型就有三种:液滴模型、

壳层模型和综合模型,彼此相容,各有千秋,相互补充,难分伯仲,都被物理学继续引用至今。即使是很完美的理论、模型或定律都不可能是最后的真理,终极真理还在极远处。我们只能逐步接近,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达到终点。地球的生态寿命还有 50 亿年,如果不被小行星撞翻的话,人类及其科学事业还要发展数十亿年。即使地球毁灭了,人类也有可能迁往别处,使智慧生命的火炬不致熄灭,继续照耀着银河系。科学不可能预测这么远的未来,只可能指出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关爱科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良好风尚。尊敬和爱戴包括老科学家在内的先驱前贤是东方文明的美德。但是,科学并不仅是属于哪一代人的财富。人类不能违抗生物界的自然规律,个体寿命苦短,永恒要靠换代延续。每过几十年,宏伟的科学事业将移往后代手中,更换主人。年逾古稀的老人,很多人对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已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取得可以讲任何话的资格。大自然的规律也提示,老人趋于倔强,胸有成竹,珍惜节翎,宽容性变小,常对下一代、第二代年轻人持严加管教态度,生怕他们出轨。此所谓人生不过百,常怀千年忧。很多人注意到,凡杰出的老科学家认为可以做到的,他总是对的;他认为不可能做到的,差不多总是错的。从长远看,中老年科学家们宜保持宽容的胸怀,为青年留下宽松的创新环境,开拓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科学史还表明,每当科学上有重大突破和理论上有重大建树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已找到了最后真理。20 世纪量子力学、粒子物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后,1980 年代曾有物理学家宣布“科学已终结”,真理已全部在握,人类可以解释一切可能的自然现象。未过 20 年,航天观测(COBE, 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1989, 和 WAMP,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 2001)发现宇宙有加速膨胀的迹象。美国航空航天局于 1998 年宣布,在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过去未发现过的“暗能量”,占总能量的 70% 以上,它对星系产生负压力或斥力,超过了物质之间的引力,导致宇宙在过去数十亿年的历史中加速膨胀。此外,还发现在占宇宙质能 28% 的物质中,我们能看到的和能觉察到的仅有 4% 左右,还有 23% 的“暗物质”存在,其组成和性质都无人知道,物理

学也无法解释。这有如一桶冷水浇头,使认为科学已经终结的人清醒了很多。

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开始于 20 世纪初,兴旺于下半叶,比欧洲晚了 200 年,补课又花了 100 年。我们的科学技术大多都是从欧美学来的。改革开放以后,进入 21 世纪,中国人信心大增,立志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科学界则相信“弟子不必不如师”的古箴(韩愈,768—824,《师说》),发誓建立创新体系,提倡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工业创新,以求为人类做一点迟来的贡献。

美国朋友库恩(Robert Kuhn)博士决意将他主编的《走近真实》(*Closer to Truth: Science, Meaning & Future*)系列的新卷在中国出版。他约邀了 50 多位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有科学造诣的企业家座谈当代重大科学问题,如脑科学、理智的力量、未来的医药、生命的起源、宇宙秩序、科学和宗教等,整理成册,出版发行,意在激励青年解放思想,勇于攀登,敢于创新,为科学进步做出新的贡献。我有幸与库恩博士交流过想法,得到他的共鸣。他嘱我写出来,在《走近真实》新篇中文版付梓时印出。我也珍惜这个机会,把近来所念,敬献给读者讨论,或许能为在中国建立更宽松的学术创新环境,对振兴中国 21 世纪的科学技术有所裨益。这就是这篇小记的来由。

宋 健

2006 年 2 月 26 日

执行编辑的话

我和罗伯特的关系很特别。每当他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往往称我是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好朋友。而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一位充满智慧与激情的恩师和慈祥的父亲。在十多年的合作中，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事情，从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到为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作政策顾问工作；从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到传播和普及新科学知识等等。我们遭遇过很多困难和曲折，甚至还有悲欢离合，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俩心里最明白。十多年来我们一起做过的项目很多，而大家关注较多的是我们在2005年初推出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当然，作为作者和总策划，罗伯特和我在创作该书的四年多中所经历的困难、挑战和承担的巨大风险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经常告诉各国记者：“要描绘亚当和我运作《江泽民传》的传奇经历，需要一整本书才能说得清楚。”他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作为罗伯特的长期合作伙伴，尤其是作为一名美籍华人，我所遭受过的委屈、误解和经受的压力，有时甚至是恶意的中伤，真的难以用只言片语来描述。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总像一个神奇的保惠师，耐心地安慰和鼓励我，有时候也会用激将法来刺激我，让我脱离困惑和沮丧，精神饱满、充满激情地投入工作。

对于罗伯特来说，我应该是少数几个较了解他的人之一（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可能仅仅比他太太——美国著名钢琴家朵拉——对他的了

解少那么一点点而已)。因为工作的缘故,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相处的时间要远远比跟我们家人的时间多。我认识的罗伯特是一个勤奋好学、不断挑战自己、探索事物真谛、追求真理的思想“探险家”。他渴望新知识,致力于寻求宇宙间事物存在和发生的实质和意义。

从2005年2月到8月,我们先后走遍了中国的19个省(直辖市)的32个城市,借着配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广宣传《江泽民传》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还记得出发前在洛杉矶机场候机室,当我看他带着的四大件行李的时候,就冲他嚷嚷起来。我们计划要访问中国的许多城市,说好我们俩都要轻装上阵的,所以我只带了一件行李。而他却带了四个巨大的皮箱,再加上手提电脑。看着我满脸的不高兴,他冲着我无奈地笑了笑说:“没办法,带了不少给我大脑的粮食!”抵达我们的第一站上海,入住饭店后,我帮他整理行李时,才看到了其中的两个行李箱里装满了杂志、报纸和书籍。他说在中国长途的旅行中,他会有很多的时间阅读,所以准备了很多的读物。箱子中大众读物类的杂志有《泰晤士时报》文学增刊、《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增刊、《外交事务》、《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福布斯》和《财富》等;科技类刊物包括《科学》、《自然》、《新科学家》(英国)、《科学新闻》、《美国科技界》、《美国科学家》等。他带的书籍更是琳琅满目,其中包括一千多页厚的、著名数学家罗杰·彭罗斯的《通往现实之路:宇宙规律大全》、神学家乔治·甘瑟勒的《上帝和时间》、哲学家威廉·韦恩莱特的《宗教哲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罗伯特·拉乎林的《一个不同的宇宙:从根本上重新创造物理学》、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的《信任:人的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医学家杰瑞·埃德曼的《意识的生物理论》、人脑学家拉马禅德兰的《探究人脑的奥秘》,以及著名心理学家南茜·安德尔森的《勇敢的新大脑》等等。

结束几次的中国基层调研之旅回美国的时候,他把读过的报纸和杂志都先后送给了中国的朋友,行李箱里腾出的地方则塞满朋友推荐和赠送的各种书籍,其中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部长赠送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著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先生著的“学习”理论文库丛书《冷溶自选集》、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先生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王慧炯教授著的《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综合研究》，还有张黎群先生等著的《胡耀邦传》等（看见这么多的中文书籍，我不禁为他的翻译秘书高兴，因为她的工作看来很有保障了）。从他随身带着的阅读书刊，我们不难想像这位年过六旬的犹太“大哥”大脑里整天思考着的问题。很多不了解他的人一定会认为，像他这样一位知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又在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任职，一定整天忙着考虑投资和金融事务。他怎么还能静下心来考虑像“宇宙的起源”、“灵魂与意识”、“基因技术与人种变异”、“网络如何改变人类”、“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在很多人看来跟他的职业根本不沾边的问题呢？

其实，探求事物的真谛，寻求真理才是他如此忘我的真正动力和激情所在。不管是探讨企业发展战略、钻研新知识还是研究中国的发展历史，在从事这些表面看来很不相干的事情背后，罗伯特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寻求事物的实质、探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种激情和动力让他对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如此着迷。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和平发展”的执政方针等，他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他认为只有自己真正理解透了，才能够深入浅出地向世界去说明和解释这些思想。他觉得世界对中国有太多的不了解，甚至有很多的误解，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用不同的平台和角度去介绍中国，让世界其他各国的人民能有更多途径“走近中国的真实”。当然，也经常有人问起：“你们在中国做了近二十年的无偿服务，这种付出值得吗？”“值，相当值！”罗伯特总是这样充满着感激之情地回答。我们感谢中国给了我们这么多独特的学习机会。我们在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在思想和知识方面中国给了我们丰富的“回报”。当然，这种回报不可能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这些收获充实了我们的生活，更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也是同样由于这种执着的追求和激情,他才会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在美国最大的电视网——公共电视网(PBS)推出《走近真实》这个电视栏目和相关配套的书籍和影像资料。他集出品人、制作人、主持人于一身,把世界上各个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汇集在《走近真实》的录影棚,针对科学的最新发展进行讨论和辩论。跟创作《江泽民传》和在中国从事其他的工作一样,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特别是罗伯特在筹备和主持节目的过程中,通过与世界大学者们的交流和讨论,让他在探究新思想、追求真理方面的欲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在很多人看来,像他这么一位精明的银行家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制作和推广这么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没有任何实际经济回报的电视栏目,似乎很不可思议,也不划算。而对于罗伯特来说,能让电视观众和读者及时了解到世界上各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让大家的认知更靠近真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和快乐!

我为罗伯特多年来致力于帮助人们“走近真实”做出的成绩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一个华人,我更为他让各国人民“走近中国的真实”所付出的努力而充满感激;当然,作为他的老搭档和小兄弟,我将永远为他寻求真理的执着追求摇旗呐喊:“罗伯特,加油!”

朱亚当

于洛杉矶

2006年2月26日

作者序

寻找意义

自从我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在中国出版，经常会有人问我，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和一名职业的投资银行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同样地，当我撰写的有关胡锦涛主席的哲学观和政策的访谈以及相关文章频繁地出现在美国的各大媒体，也有人问我，作为一名脑科学专业的博士以及公司兼并与收购领域的专家，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宝贵时间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介绍一位中国领导人的远景目标？而今，这本关于最新科学知识的意义和内涵的书即将出版，人们再次提出：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

说也奇怪，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居然是相同的。我为什么撰写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传记，我为什么要向美国民众解释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政策，以及我为什么写作本书，这三个问题所蕴藏的深层次动机是一致的。我之所以做这一切，是因为我被一种激情所驱使：那就是去理解事物的真实意义。我试图理解事物之所以存在和发生的理由。这种要了解事物的愿望关涉到我的三大基本兴趣点：中国、投资银行和前沿科学。

而且，我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在美国，我制作、主持了一档关于科学新知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叫做“走近真实：科学、意义与未来”，展现了科学家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前沿科学、新知识和基本问题的不同

观点(www.pbs.org/closetotruth)。这档节目的许多内容形成了本书的基础。《走近真实》邀请了世界一流的专家探讨最新的科学知识,并试图阐明这些科学新知的内涵。我撰写的《科学:民主化的使者》(发表于2003年9至10月的《美国科学家》)一文,探讨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为何能影响全球社会,以及如何通过这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将观念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人们聚集起来,并实现统一(无论他们是否存在种族、宗教和政治的分歧)。

科学增强了我们的辨别力;科学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判断事实与理论是否相符,或者,评估在特定的政治舞台,现实环境是否支持固有的立场。科学精神是一种普世主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普遍的;它穿越文化和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禁锢,传达和沟通人们的审美愉悦、新发明所产生的物质利益以及辽阔宇宙的神秘莫测。科学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严肃地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最有效的帮助可能就是对中国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支持。通过增强科学精神,我们将促进人类思想的统一。

实际上,我自己一直推崇科学精神。在我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我始终致力于运用科学方法从事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特别是在我的投资银行和公司战略事业中。我试图将分析性的、合乎逻辑的思想浓缩成一种科学方法来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例如我所专注的兼并与收购工作。这并不是说商业与金融是纯粹的科学,或者总是合理,而是去力图发现在哪个环节人应该具有理性,在哪个环节人必须超越逻辑和理性去理解人类心理和人类社会的微妙性、复杂性甚至非理性。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商业和金融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的原因。

由于我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科学的思想观,所以当胡锦涛主席首次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理论——一套针对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的理论时,我顿时对他的理论产生了兴趣。也正是对胡锦涛主席“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兴趣促成了我的中国之行的诸多见闻。更特别的是,我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向世界和美国的媒体讲述当代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她所创造的伟大成就和面临的巨大挑战。